■聚　焦

一部小说的开篇和另一部小说的结语

——文化传承与文艺原创力

□谢　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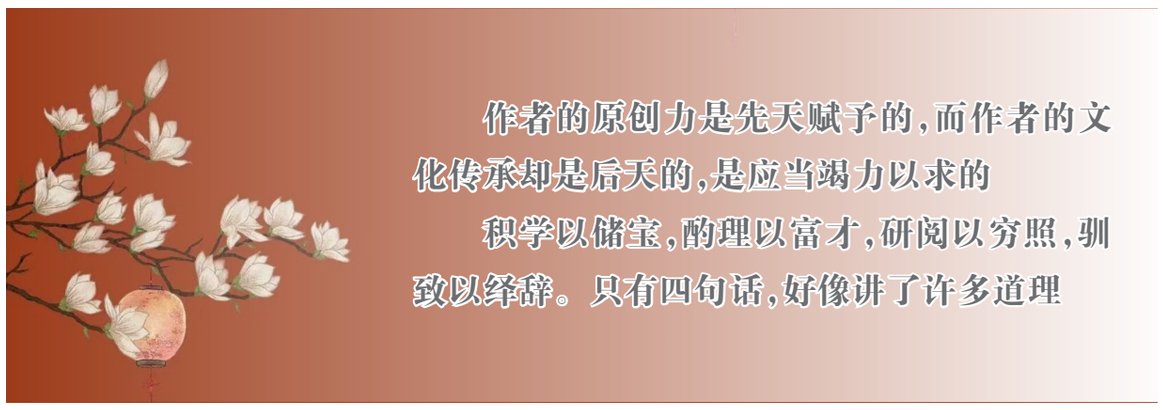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为了向这句话致敬，我从莫斯科来到图拉州，来到亚斯纳亚-波良纳镇。庄园寂静，一条白杨夹峙的黄土路，引导我来到他的墓园。芳草萋萋，墓木深拱，卫护着一抔黄土，他长眠于此。墓地没有任何标识，甚至没有一个简单的木质十字架。列夫·托尔斯泰家族富有，庄园占地极大。但他选择了极简朴。托尔斯泰信奉他的宗教，他愿意过平民的日子。他同情安娜·卡列尼娜的命运，写了这个女人悲剧性的一生，包括她最后的结局。安娜非常美丽迷人，我们记得舞会上穿着黑色天鹅绒舞裙翩翩起舞的她，堪称绝世佳人。

这里我要插叙一个看来无关的记忆。我的一位已经远行的朋友，生前在车站迎接一位女士，当她款步而下，一声惊呼：“你不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吗！”于是大悦。可见作家笔下的人物是永生的。列夫·托尔斯泰还写了《战争与和平》《复活》等传世之作，他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伟大的文学传统。他不囿于自身的生活阅历，目光也不停留在庄园一隅，他有博大的胸襟和深远的思考。梁赞车站的神秘死亡令我们叹息，但他的结局仍是深不可究的永远的话题。

说了一个小说的开篇，再说一个小说的结局。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也是至今仍然保持着生命力的伟大经典。它是黑暗中国的第一声质疑和抗争的“呐喊”！一个患有神经病症的“狂人”，向我们展开了一部历史。作者告诉我们，那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于是发现，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在小说的最后，先生振臂一呼，写下了沉重的结语：“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篇末注明写作日期是1918年4月，这就是说，鲁迅是有感于封建礼教的束缚，为唤醒国人而借“狂人”之口发出的“呐喊”。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说了如下一段话：“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

我常感当下文艺写作，作品奔涌堆积如山海，虽时有佳作信息传来，总觉非我所待。可谓心病。



午夜醒来，突然脑中响起久违的乐曲声，细细一听，乃是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那是燕园除夕薄暮的记忆。当日除夕晚宴过后，大、小饭厅顷刻转换成了舞场。学生们冒着纷飞的雪花涌向这宽阔的“舞池”，其中有我。大家在舞曲中翩跹起舞。此刻奏响的是拉威尔的杰作《波莱罗舞曲》，激荡的节奏敲打着单纯、甚至幼稚的心灵。我们欢乐，不知来日何日。

于是常想，我们的文学艺术中有激荡的节奏让我们沉浸在欢乐中而忘却焦虑的作品吗？我们饥渴，我们的心灵需要抚慰。当今排山倒海的文艺有成就，但也有缺失，而缺失的正是我们所渴求的和期盼的。是的，作家们告知我们，有的作品揭示了他们内心的困顿，甚至揭示作家感知的周遭的丑陋。但我们依然感到匮乏，我们呼唤曾遭贬抑的崇高，我们断然拒绝耽于游戏和娱乐的平庸和琐屑。

文艺的多样性是我一贯的追求，我反对单一的文艺。特别反感而且排斥文艺的“一体化”。但我有我的期待，我期待积累了、融化了人类良知和理想的高雅和温情。我期待有着厚重的文化传承的作品：贝多芬叩打着人类命运之门，《欢乐颂》呼唤着友谊永恒；齐白石的色彩鲜丽，充满了童趣；罗丹温柔，一吻千秋；李白浪漫，创造了中国人引为骄傲的永不消失的月亮；拜伦的吟咏，永远是激情少年的青春；王羲之醉后一气呵成的《兰亭序》，散发着永远的墨香；颜真卿方正雄浑；张旭放浪飘逸……都是我们的心灵底蕴，他应当进入我们的作品，并成为这些作品的灵魂。

前不久，我因听到一位作家说他不读、也不喜欢《红楼梦》，非常吃惊。由此我想起宝玉初见黛玉那场面，宝玉说“这妹妹我见过”。此语一出，石破天惊！而我们的作家却是茫然不为所动，甚至拒绝，我为此深深地不安。我们需要从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化积存中，也就是从前人的创造中吸取营养，传承一切优秀的传统，创造体现当今时代精神的新的作品。而现在我们仍然面对匮缺，当代文学仍然期待作家为我们创造出无愧于前人、也无愧于今人的作品。太多的平庸和琐碎充斥着我们的书刊和屏幕，我们有太多对于文化的无知和盲点。为此，也可以说，我们有太多的遗憾。

其实，对于所有的艺术创作而言，作家和艺术家的原创力总是第一和首先。构成原创力的条件很多，作家艺术家的生活阅历，以及对于这些阅历的处理能力极为重要。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基于生活实际的想象力。所谓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正是一种对于想象力的要求。一些作者往往会满足于她所拥有的有限的经历和经验，很难从这些经验中“突围”。

我在前面引用了列夫·托尔斯泰和鲁迅的作品，引用了他们的开篇和结语，这些文字体现了作家的大境界和大视野。那是关于历史的和人类的一种久远的思考，前者乃是宗教的思考，后者则是关于历史的思考。文艺创作者要从人类和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人生、世界、幸福和痛苦、复活与再生、战争与和平……作者要避免囿于一隅，避免满足于小体验而缺乏大智慧。而达到这境界的道路很简单，也很艰难，这就是文化传承。作者的原创力是先天赋予的，而作者的文化传承却是后天的，是应当竭力以求的。我在此不想引用目下流行的外国人的言论，宁愿引用我们耳熟能详的“老话”，那就是：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只有四句话，好像讲了许多道理。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第一印象

城市　记忆　爱情

——贺彬小说三原色：

□刘建东

很明显，记忆是贺彬小说中的主题。纳博科夫在他的自传《说吧，记忆》中说：“生动地追忆往昔生活的残留片段，似乎是我毕生怀着最大的热情来从事的一件事。”记忆是众多作家灵感的发源地。同样，记忆给了贺彬充分展示他的文学才华、展开想象的空间。贺彬的小说从他熟悉的城市开始。夜晚，西南重庆，本属于这座庞大城市的喧嚣市声，被贺彬用质地粘稠、敏感的语言过滤掉了。从他笔下鱼贯而入的人物，仿佛都是从白昼的紧张生活中，匆匆地投入到略显松弛的夜晚之中，在城市霓虹的尽头，脸上闪烁着夕阳的余晖，徘徊于昏暗而高低错落的街巷中，回忆或者低语，从早已逝去的生活中，打捞着应该属于自己的小小的温暖与片刻的安慰。这是文学视角下，一个在时代的高速轨道上运转的城市，是城市中普通人的活色生香的生活图卷，是六个令人伤感的爱情故事，这是重庆作家贺彬，在《乐园》这本小说集中，为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精神世界，记录下的一些生活侧面，以及生活的水面之上及之下的情感、记忆。

《乐园》，贺彬著，重庆出版社，2023年9月

记忆中，最令人感怀的是他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可以说，贺彬的小说，不是颂歌，也不是挽歌，而是记录，是普通人的生命小传。小说质地坚硬，仿佛总有一双文字之外的眼睛，以犀利的目光，紧盯着小说里的芸芸众生，就像是阳光，能穿越时光与文字的丛林，抵达每一处角落，抵达心灵深处。他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悲喜人生。小说又是柔软的，作家是隐身的，只让人物自己说话。有过长期记者生涯的贺彬，对现实生活的把握直接而敏锐，对文学特定对象的描写准确生动。我一向以为，作家不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什么，就写出了什么人物。而是因为看到了什么，从而想到了什么，才会有文学人物的产生。人物的面貌，命运的走向，往往是作家自己对历史、对现实、对世界的理解，有时候倾注了作家一生的思考。所以作家对他写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极为珍惜的，对每一个人物都是负责的，甚至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六个故事，时代背景大致相同，生活背景各有不同。《口琴》里的知青贺明丰和童秋萍，最普通最底层的小人物，有着并不幸福的家庭背景，共同的下乡并回城当工人的曲折经历，家庭、身体、情感的种种不如意，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也是他们必须背负的一切。《啊朋友再见》里的记者胡一飞，在不断的职业迁徙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属之地。《淹没》中的司机何秋，被雇用为一对偷情者开车，旁观与他身处不同阶层人的另类生活。《乐园》里的教师何文秀，一个被生活随意拨弄的遍体鳞伤的女人，对生命依旧坚守。《两个兄弟》中的新闻人宋小雨、马仲文，因为同一件事的不同态度，人生轨迹随之而改变。《请跟我来》中的林天星，为了实现所追求的理想告别工厂，投入到时代巨变的洪流中，最终却收获了失落。贺彬对这些生活不安定、心灵脆弱的社会人群特别感兴趣，并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与关注，他们是时代的同行者，被时代裹挟着，有时春风得意，有时负重前行，他们的心灵难免会有所损伤。这些人物似乎均游离于生活核心之外，他们在不被人关注的边缘地带徘徊，在各自不同的命运之途中承受着苦难与磨砺，他们都处在不安而焦虑之中。他们是失重的人，轻飘飘的，无所依靠。在可供腾挪的有限生活空间之内，他们尽可能地用哪怕生命的全部，来追寻一丝微光。贺彬写出了普通人生活中的无奈与奋争，写出了小人物在生命旅程中的艰难与希冀，写出了真实人生中的明亮与暗影。

但贺彬并不悲观，他意识到了个人命运的复杂性与环境对个体生命成长的影响。所以，在展开对那些生命的记忆时，他将笔触深入到他们广阔的内心世界，倾注到每一个人物的情感上，他找到了一个可以慰藉心灵的方式，爱情，来充实小人物的生命，来实现人物精神成长的完整性，让他们在微暗的生命轨迹中，寻找到了一丝温情，一道光亮。爱情犹如是生活荒漠中的一滴水，给他们单调乏味阴郁的生活带来了一抹亮色。爱情还是对于漫长生命的坚毅的呼应，是对于爱与抗拒、情感与理智、忍耐与冲动的有力的诠释。《口琴》里的贺明丰是软弱的，他不得不听从母亲的劝告，中止了与童秋萍的恋情。在以后并不幸福的漫长生活中，这段爱情始终像是口琴发出的乐声一样，回响在他的身体里。这是一段隐秘的、等待回应的爱情。虽然，结局并不如人意，卑微的主人公贺明丰却得到了内心的安宁。当象征爱情的口琴始终若隐若现地出现在贺明丰枯燥乏味的生活中时，它就像是一副黏合剂，黏合了贺明丰残破而脆弱的内心。《啊朋友再见》里，胡一飞也是脆弱的，在变幻莫测的命运中，他逃避着情感，也沉醉其中，不停地寻找爱情填补精神空白。《乐园》中的小林和何文秀之间简单朴实的爱意，是他们在各自失败而不可言说的情感生活之后，找到了片刻安宁的栖息地，但所有虚妄的努力，最后只能是继续随风而去。对于作家来说，或者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来说，爱情并不是终点，也并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爱情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一个话题，在更多经典的作品中，爱情主题甚至是一部重要作品的灵魂。在贺彬的小说里，似乎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特点，爱情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从他的人物身上，我们似乎看到《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子，看到了被各种复杂的含义所稀释着的爱情，四分五裂的爱情故事虽然并不具备普遍的意义，却也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的烙印，令人扼腕，令人动容，令人回味，也令人感叹：生活如此不易，任何琐屑的爱情都值得书写。当贺彬一个接一个地不厌其烦地书写着这些小人物的爱情时，其实也是在对人性中美好一面的宽容与赞许。通过爱情，记录这些普通人不同的生命轨迹，以及留给世界的声音，他们的生命才有意义，而正是这些丰富的声音，才构成了广阔世界的同声合奏。

城市、记忆、爱情，构成了贺彬小说的三原色。它们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汇成了属于作家自己的文学的河流，在这条明暗互现的河流之上，漂荡着冷静与犹疑、追寻与徘徊。作家的追忆是建立在城市的时代之影中，而城市的身影又折射到人物的丰富内心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正是因为作家对于时代细微之处的敏感、对于人心深处的末梢神经的敏感，作家记忆中的城市焕发出了人性的光辉，而作家精神的成长，回荡在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身上，使每一个人物都从细密的叙述之中，呼啸而来，撞击着我们本已疲惫的心灵。

（作者系河北作协副主席）

将赤子之心形之于文

——评徐兆寿《斯文凉州》

□巴陇锋

徐兆寿新著《斯文凉州》以娓娓道来、夹叙夹议的大散文笔法，将河西走廊古凉州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切片和样本，给予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关照，自古到今、从源至流、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地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仔细的剖析和审视，指出中国文化具有道法自然、欣欣家国的整体性优势，表明继承传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文化自信鼓与呼。

《论语·雍也》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徐兆寿能将赤子之心形之于文，本就不易，而尤能够注意到当下流媒体时代接受的即时性和碎片化特点，充分照顾和考虑读者的接受喜好。纵览全书可知，在章节安排上，多篇幅轻便、适于轻阅读的篇什。全书35万言，被分为411节，平均每节不足千字。但事实上，作者所言说的话题却绝非无足轻重，诸如“中华文明格局下的凉州”“寻觅河西走廊的历史”“生死之道”“汉武帝的天马梦”“关于铜奔马的命名”“凉州外贸引领天下”“三大文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等，由此观之，全书乃轻便为体、宏大为骨的正经言说，目的是在碎片化阅读时代，让传统深入更广大的人群。

事实上，本书正是以知识的丰沛和表达的趣味性见长，让观众开卷有益的，作者时刻不忘在娱乐观众的同时给观众以知识的塑造。如对“张掖”的解释，如“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它有两个意识形态”“张骞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的观点，如“学术共同体”“道法自然是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的元气发生地就在昆仑”等见解。作者通过对五凉文化的充分言说，给观众和读者知识的同时，的确将被遮蔽、被悬置、被边缘化，甚至已经趋于模糊的凉州文化、河西文化，重置于世人眼前。仅此，就善莫大焉。而五凉文化的厘清，无疑有助于廓清中国文化的一些迷雾和误区，因为它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

故事性强，悦读怡心，是《斯文凉州》一书另一大特色。得益于作者学贯中西、通晓古今，其善于讲述历史故事，如刘邦遭受“马邑之围”、如张骞的故事、如汉武帝的天马梦、如郭沫若给铜奔马命名的经过、北京王沮渠蒙逊对石窟开凿和佛教事业的了不起贡献、鸠摩罗什与姚兴的奇妙遇合以及佛经的翻译、鸠摩罗什吞针故事、“三寸不烂之舌”故事、敦煌莫高窟壁画佛陀和鹿头梵志的故事等等，都颇有启发意义。作家还不时联系朋友熟人名人的逸闻趣事，如贾平凹关于“普通话”的解嘲之语、赵学勇的名老中医岳父故事、陪同雷达游天梯山石窟并听贤孝的经历……凡此，不仅增加了趣味性，而且降低了学术性著作的“硬度”，具有很好的调适作用。夫子自道，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也是作者与读者拉近距离的绝妙方式，如武威人的自信故事、长篇小说《鸠摩罗什》的创作动因困惑及情节安排等等、拜谒孔庙并寻访子贡守墓处的经历和感慨等，读来都亲切暖心。

图文并茂，诗意盎然，是徐兆寿著作的惯有特色。精美的彩色照片与富于文采的到位文字的互注，适应了读图时代的需求，而且，书中“富于文采的到位文字”往往充满诗情画意，且不乏诗家语。如在《西方诸山》里，作者先用自己的《大通河边》小诗，让人去领略“有限的人在无限的时空中的一次慨叹”；再用昌耀的诗，说明环境的奇崛、空廓、寂寥；结尾作者又附上自己的诗《日月山》，令人陶醉。又如，在《水系与绿洲》里，用张子选诗句“羊群啃着石头上的阳光”，说明酒泉的戈壁荒凉，非常传神。干旱少雨，让河西籍的作者在复旦读博期间见雨兴起，写下《又下雨了》的小诗。这里，诗情和文意契合无间。作者还信手拈来匈奴民歌《匈奴歌》，与论说相映成趣，富于情调。

学理梳理和个人经验分享紧密结合，令人如当面晤谈，人文共赏，美不胜收。书中，理论阐述部分和的作者的私人化和个人化叙说，多用两种不同字体区分开来，语体风格也明显不同。《农耕文明——道法自然》正文如题，讲凉州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最是合宜；之后，图文结合，用楷体文字回忆女儿的出世及乡间生活，得出：天不变，道亦不变，农人们习焉不察的生活中，蕴含着久已失传的“大道”。《凉州人是如何看待死亡的》，则将私人化叙述放在正文中，在厚葬和薄葬的辨析中，作者倾向薄葬，但笔锋一转又谈及“薄情的薄葬到底好不好”，令人深思。最后一节《传统的养生观念》，将自己的健康状况和农民老父的健康状况作比较，特别是通过年迈父亲扛一百多斤面粉一口气上六楼与我们好几个知识分子抬着同样的面粉歇了几歇才上楼的狼狈样作戏剧化比较，说明了父亲的不言之教，也传递出中华文明传统的博大精深。

（作者系陕西省电影行业协会剧作专业委员会主任）

■评　论

丰富多元的写作谱系

——《海飞自选集》：

□杨庆祥

最近这些年，我陆续读到海飞的一些作品，其中一些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些作品以类型见长，以谍战居多，这使得海飞成为了谍战小说的代表作家。这当然毫无问题，中国的类型文学在当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正是有赖于海飞这样一批作家的努力。但是另一方面，据我了解，海飞的创作起步很早，作品种类多样，风格复杂多元，如果仅仅以类型谍战作为他的“身份标签”，实际上是有局限的。四卷本的《海飞自选集》，正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可以说，通过这一套自选集，海飞展现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创作风格，同时也丰富了他的作家形象。

《海飞自选集》一共四卷本，涵盖了多种题材和风格。第一本《往事纷至沓来》以民国为背景，通过讲述那个时代的故事，展现了历史的沧桑变化和人物的命运浮沉。这类题材是晚近当代文学写作的热门，既可以满足读者历史阅读的快感，又能够规避一些敏感问题。但这类题材也容易写得空洞，往往是“事件”大于“人物”，“故事”高于“情感”。海飞的作品则不然，他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深入挖掘，直观具体地呈现了民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情世故，同时，他笔下的人物相对形象细腻，这使得他的民国书写颇有质感。第二本《老子的地盘》以现实题材为主，写的是当下普通民众的生活。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描绘，呈现了一个烟火气十足的社会底层世界。这一类书写也许受到了新写实主义的影响，最能见出海飞的写实功底，这也能部分解释他的谍战小说能够大获成功的缘由，谍战虽然往往以架空的形式结构故事，但是对写实却有极高的要求，无论是从创作还是阅读的角度看，没有扎实的写实笔法，就不会有成功的类型文学。第三本《赵邦和马在一起》风格更加突出，这是一本以赵邦为主人公的系列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以夸张幽默的手法展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虚构世界。正常的逻辑不能解释生活的荒谬，于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才能真正地呈现生活的“内在真实”。夸张、幽默、反讽是当代文学重要的一脉传统，可惜目前继承者越来越少，海飞的这些写作带有实验的性质，其实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第四本《遍地姻缘》讲述的是发生在一个名为“丹桂房”的江南小镇里形形色色的故事。在这本书中，海飞细腻地描绘了江南小镇的生活场景以及生活其中的各色人物。这是一个充满诗意和浪漫的江南世界，也是海飞建构的一个写作的原乡，也许可以媲美莫言的东北高密乡、苏童的香椿树街。在地方性的意义上，这一类的写作原乡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海飞的这一类写作笔墨自如，情绪饱满，画面感极强，在他最近出版的“古谍系列”中，这一江南风格和审美发挥到了极致。

《海飞自选集》，海飞著，花城出版社，2023年7月

我最近读到的海飞的作品是长篇小说《昆仑海》，属于他的“锦衣英雄系列”的第三部，也是收尾之作。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其实是多种风格的融合，既有武侠小说的因素——尤其是古龙式的人物形象设定；又有历史小说的框架——其故事发生时代设定在明朝；同时还有风景小说的优美——尤其以江南的意境取胜。这再次证明所有的类型都来自于综合，也提醒我们作为类型作家的海飞其丰富驳杂的精神图谱，如果我们阅读了《海飞自选集》甚至更多的与海飞的写作有关的资料，就会明白其来有自。在这个意义上，《海飞自选集》不仅提供了一批精湛的文学作品，也不仅仅发挥着前文提到的校正丰富作家形象的功能，同时，它也对我们了解雅俗文学之间的互补互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雅俗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更深入地理解当代文学史的实践生成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